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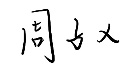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实证研究**

|  |  |
| --- | --- |
| 院系 | 管理学院 |
| 专业班级 | 财务1801班 |
| 姓名 | 周子乂 |
| 学号 | U201815896 |
| 指导教师 | 石冠群 |

2022年5月26日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2022年 5 月 2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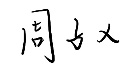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障、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学位论文管理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省级优秀学士论文评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囗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囗 。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 2022年 5 月 26 日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摘 要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一直是党和政府致力达成的远大奋斗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1978年农村居民贫困率为97.5%，人口规模高达7.7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大规模增长，党和政府始终贯彻有计划性的扶持工作，专注于人民基础保障、农业、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等各方面。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达成了显著的脱贫效果。截至2020年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由此，我国减贫工作的重点转为缓解相对贫困。

本文通过对减贫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异质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寻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减缓相对贫困的不同效用。并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程度和实际的发展情况，提出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全面减贫尤其是乡村减贫的方法和相关建议。

实证结果证实，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是解决相对贫困行之有效的工具。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数字渠道的金融触达性和完善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减贫起显著作用。此外，通过异质性分析证明，在经济水平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强于经济落后地区强于经济中等地区。因此，应当发展互联网金融技术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大众，推动产品结构多层次化、促进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良性结合，因地制宜指定政策，从而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并建立起对于减贫问题长效的正向机制。

**关键词：**减贫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经济水平；相对贫困；区域异质性

Abstract

Eradicat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have always been the lofty goals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overty rate of rural residents was 97.5% in 1978, with a population of 770 mill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continued to grow on a large scale.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have always implemented planned support work, focusing on people's basic security, agriculture, rural elderly care, edu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hole nation, China has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y the end of 2020, 98.99 million rural poor people had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erefore, the focus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work has shifted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ducing relative poverty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actu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method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nclusive Finance to better contribute to overall poverty reduction, especially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solve relative pover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ducing poverty of relatively poor groups by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channels and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addition,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prov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as follow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are stronger than 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and stronger than medium-sized areas. Therefore, we should develop Internet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suppor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serve the public, promote multi-level product structure, promote the benign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e and digital finance, and specify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positive mechanism for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conomic level; Relative povert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3

2 文献综述 6

2.1 数字普惠金融基本概念的相关研究 6

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机制的相关研究 8

2.3 数字普惠金融和省域异质性的相关研究 10

2.4 文献述评 11

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的研究设计 12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

3.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16

3.3 变量定义和实证模型 16

4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 19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9

4.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22

4.3 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减贫效应研究 23

4.4 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减贫效应研究 25

4.5 稳健性检验 28

5 结论和建议 30

5.1 研究结论 30

5.2 研究建议 30

5.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31

致 谢 32

参考文献 33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一直是党和政府致力达成的远大奋斗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1]的相关数据，1978年农村居民贫困率为97.5%，人口规模高达7.7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大规模增长，党和政府始终贯彻有计划性的扶持工作，专注于人民基础保障、农业、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等各方面。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达成了显著的脱贫效果。截至2020年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我国已经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2]。由此，我国减贫工作的重心转为缓解相对贫困。

普惠金融一直是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相对贫困地区推广传统金融服务面临着多重困境。第一，传统金融服务存在地理空间限制和较高的线下成本，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第二，由于个人信贷评估体系的不健全和不精准，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服务偿债意愿高、能力足的群体，以避免坏账的产生，导致了贫困群体贷款难。第三，在追求效益的层面，传统金融依赖线下机构、农村工作办公室，在贫困地区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和较高水平的效益[3]。

普惠金融的概念在2005年首次提出，意在使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方便、及时、高质量、有尊严的金融服务。随着产品的创新性发展和科技的高速进步，普惠金融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如生物识别、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技术创新，既使金融安全得到保障，又让低价、高效的金融服务成为可能。 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泛指一切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展开普惠金融业务的模式”，标志着开启了数字普惠金融新时代。同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强调数字技术与互联网通过包容、创新、效率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许多发展机会。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快速进步，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规模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应用和推行在减缓农村贫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自从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累计发放贫困再贷款6688亿，发放精准扶贫贷款9.2万亿[4]。截至2020年末，乡村振兴卡发放2172.42万张。电子支付的普及率稳步增加，城乡之间差距持续减少，移动支付业务在农村增长迅速。普惠小微贷款快速增加，余额高达15.1亿元，继续保持价降、面扩、量增的趋势[5]。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打脱贫攻坚战过程中缓解相对贫困的现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视角下，理论分析其减贫效应的路径和机制，并建立实证模型，以我国31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回归分析、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全面减贫尤其是乡村减贫的方法和建议。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数字普惠金融的演变过程及意义、减缓相对贫困面临的困境、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对减贫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果、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异质性的关系。

首先，本文将结合我国31省市的经济发展、财政、人口、产业发展等宏观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各类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然后，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于省市进行划分，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和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代实施稳健性检验。

本文致力于借力数字时代探求“互联网+普惠金融”与减缓相对贫困的问题，为解决相对贫困指明理论措施和方向，使用我国31省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并以经济发展异质性为划分标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具有理论价值。

1.2.2 现实意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宏伟蓝图。2020年，是全面小康的决胜年，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对未来提出了诸多期望：人民生活更加宽裕、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城乡发展的差距得到显著减小，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坚定进发。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转为解决人民的相对贫困。

目前，在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疫情冲击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刺激国民经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社会发展动力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21年，居住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36.11%，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减缓农村相对贫困、推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地区消费支出也能为国家经济贡献强大的力量。

普惠金融的推广旨在为各类阶层提供高效、便捷、低廉的金融服务，而其中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人民的惠及程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将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整合到普惠金融中，成为了金融科技的新兴产物。基于“数字化”的优势，金融服务的资金成本得以降低、服务覆盖面得以拓展、服务效率得以提升，使金融机构向低收入群体贷款的成本降低、收益提高。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支付服务得到广泛的推广，较高的普及性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精准度、可负担性的提高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从而达到减缓相对贫困的目的。因此，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政策性建议对于促进金融业均衡发展、增进社会平等、改善我国民生都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通过研读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课题的重要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方式、选取的模型以及研究相关问题，寻找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切入点，探究研究对象的性质，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依据现有理论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

2） 实证分析法

本文将运用SPSS、Stata等统计分析软件，选取2011年至2020年我国31省市的财政、人口、经济、产业、收入、消费、互联网应用程度等宏观数据，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在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三个子维度的子指数来代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程度。提出相应的基准模型，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进行验证。

3） 分组研究法

在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后，为了更好地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提出更适配的政策建议，本文将进一步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我国31个省市进行划分，分样本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子指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减贫效应是否有所差异。

1.3.2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进行实证回归和异质性分析。

1）文献综述主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其减贫效应、其发展的省域异质性的文献进行展开。基本介绍从发展历程、作用与意义、测度方式展开；减贫效应分别从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进行归纳；省域异质性从三方面的异质性进行介绍。

2）实证设计中，基于长尾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马太效应、基数效应提出三个基本假设：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区域存在异质性；其子指数的减贫效应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效果。并建立起线性回归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

3）实证结果分析部分。第一，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第二，基于基本模型对样本数据做全样本回归，得出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的估计值，验证相应假设。并加入调节效应验证农业占比和交通基础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影响；第三，分样本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判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子指数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减贫效应的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4）结论与建议中，本文将归纳实证研究结果，结合以往的文献研究和现有理论从普惠金融建设、政府措施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并基于本文提出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研究背景

提出研究问题

文献综述

理论分析

提出假设

实证分析

回归分析

异质性分析

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普惠金融基本概念的相关研究

2.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焦瑾璞等[6]提出我国普惠金融的演变历程、代表性事件和特征如表2-1所示。

表2-1 中国普惠金融的演变历程

|  |  |  |
| --- | --- | --- |
| **发展阶段** | **代表性事件** | **特征** |
| **公益性小额信贷**  **(1990s)** | 1993年，中国建立了首家小额信贷机构。 | 通过公益性小额信贷，旨在改善农村贫困的经济状况。 |
| **发展性微型金融**  **(2000-2005年)** | 央行全面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相关政策，建立农户贷款档案，并开展基于农户信用、无需担保抵押的贷款。 | 正规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服务，为就业、居民生活提供贷款服务，微型金融体系初步形成规模。 |
| **综合性普惠金融**  **(2006-2010年)** | 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农村按需建立小额信贷机构。 | 小贷组织和村镇银行快速介入；小微企业被纳入服务范围；普惠金融呈网络化发展趋势。 |
| **创新性互联网金融**  **(2011年至今)** | 互联网金融产品普及，更多群众能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 第三方支付、P2P信贷、移动支付兴起，互联网金融体系成为主流趋势。 |

刘喆[7]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服务阶段(线下储蓄、理财、融资)、互联网化阶段(移动端业务拓展：网上银行、P2P平台、支付宝、微信支付)、数字化阶段(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金融科技阶段(以科技创新为主动力)。我国目前处于金融科技阶段，在向“以政府指导为基础、以金融机构为主体、以互联网企业、新型科技企业为补充”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积极转型。

根据《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8]，目前我国的金融科技稳定增长，银行数字化转型、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供应链金融稳步扩张，数字普惠金融在精准脱贫、服务“三农”、智慧城市建设、小微企业融资方面都积极涌现出新服务、新产品。

2.1.2 数字普惠金融的意义

1） 改善收入不均，减缓贫困

Khan等[9]基于非洲数据，实证表明普惠金融能有效减缓非洲的贫困问题和收入不平等。宋晓玲[10]、张贺和白钦先等[11]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证视角，证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行可以大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倩、李政、熊德平[12]以中国201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利于减贫，并且贫困人群获益多于富裕人群。刘锦怡、刘纯阳[13]经研究发现互联网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成本、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广泛性和使用深度性，直接或间接地缓解了贫困。周利、冯大威、易行健[14]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增加金融可得性两种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 刺激收入增长，促进居民消费

Geda等[15]使用埃塞俄比亚的面板数据证明普惠金融能够借助信贷、储蓄等服务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易行健、周利[16]通过对中国家庭的追踪调查，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居民消费，且该效应在农村、中低收入家庭、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邹新月、王旺[17]基于农村、城镇居民的家庭收支，实证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正向刺激农村居民消费，且对东部农村影响最大。

3） 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梁榜、张建华[18]充分利用专利数据，万佳彧、周勤、肖义[19]使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证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极大程度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励企业创新。唐文进、李爽、陶云清[20]基于28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提升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长期的正向效应，且效应从东部到中西部逐级增强。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的延伸，线上金融服务更具可得性和可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推行为弱势群体、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对国家总体经济、居民生活、企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2.1.3 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

国外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普惠金融水平。Sarma[21]等基于Beck[22]建立的八个基础指标以可获得性、使用效用、使用情况为度量标准，首次创建普惠金融指数。Arora[23]在此基础上纳入使用成本、地理渗透性、便利性，进一步完善了IFI。Gupte[24]引入使用成本、渗透性、便利性、效应性测度普惠金融的水平

我国学者郭峰等[25]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通过测度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建立了一套覆盖中国内地31省市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标在国内学者研究中国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课题时被广泛使用。

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机制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众多，随着“数字化”的引进，众多学者也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作用机制做出了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以下通过直接机制、间接机制的角度分别进行梳理和总结。在相对贫困的概念被提出之后，也有少数学者探讨相对贫困的减贫机制，但截至目前尚不完善。

2.2.1 数字普惠金融消除绝对贫困的效应与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在直接影响层面，借助以下三个优势，为长尾群体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供应、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从而达到缓解资金约束、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收入水平的效果，最终实现直接减缓贫困的目的[13]：

第一，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一方面，互联网的“泛在性”突破了物理上的空间限制，推动了互联网信贷、保险等网络移动端金融服务的进步，通过增加长尾人群的金融可得性直接减缓农村贫困，并且效果显著于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间接减贫[13]。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侧优化刺激了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程度，激发了金融减贫的外部动力，也直接推动和扶持了农村减贫的工作进行[26]。

第二，增强金融扶贫的精准性。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定位到合适的贷款人群。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更高效地分析贷款人的个人信息和信贷相关数据，从而更精准地锁定贷款人画像，完善个人的征信系统，解决了借贷过程中金融机构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长尾人群更易获取贷款[12]。另一方面，贫困人群也能享受到最贴合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借助互联网平台大、覆盖广、操作简便的优势，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过匹配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需求，推出满足其融资、保值、理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8]。

第三，提升金融交易的可负担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简化传统金融服务的操作流程，并减少政策性扶贫资金流通经过的相关部门，避免流通过程中的贪污等问题造成扶贫资金流失。首先，数字金融通过拓宽服务渠道(如网上银行、互联网信贷、微信支付)，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供应成本。其次，数字金融通过移动端服务克服了线下办公的空间限制，降低了线下的时间成本。并且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金融服务平台能够通过网络教学普及金融知识、推广金融服务的相关介绍和相应应用，多方面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获取成本。最后，区块链技术通过简化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和促进信息的对接流程使得金融服务的中间成本大幅降低[26]。

数字普惠金融在间接影响层面，通过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间接实现减缓贫困的目的：

第一，通过包容性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对包容性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包容性增长通过各类渠道和路径再带动贫困减缓[27]。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28]通过分样本分析，实证发现数字金融正向激励包容性增长，从而提升家庭收入，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效果尤为显著。于敏、王小林[29]发现包容性增长通过提升基本社保水平、提高人力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加强收入分配从而促进贫困减缓。

第二，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普惠金融首先能够在总体上带动国家生产总值的提升，然后通过涓滴效应反映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达到减贫效应[30]。涓滴效应指，在国家总体经济增长时，不优先为贫困人群提供扶贫政策，而是利用经济的总体增长引发就业、消费的增长，再利用财政政策使贫困人群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福利。其中，政府可以通过诸如税收的财政调控，减少贫富差距，使得涓滴效应的机制更加亲贫化，以此实现相对贫困人群增加收入、减缓贫困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出台更多扶贫减贫的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以增强公平性，缓解相对贫困[31]。

根据现有国内外文献，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贫困的机制总结如图2-1所示。

直接

间接

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增加金融减贫的精准性

提升金融交易的可负担性

包容性增长

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

减缓绝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缓解资金约束

增强抗风险能力

提升收入水平

图2-1 数字普惠金融消除绝对贫困的作用机制

2.2.2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

王凤羽、冉陆荣[31]以农村人均收入为贫困度量指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细分维度证实了其能够减缓相对贫困。郭小卉与冯艳博[32]以城乡收入差距度量相对贫困，证实了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并证明了覆盖广度对减贫影响最显著。金发奇、言珍、吴庆田[33]以收入、消费差距代表相对贫困，证实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率偏低，区域之间的差异大。

目前，文献中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基本仍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机制保持统一。

2.3 数字普惠金融和省域异质性的相关研究

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省域差异性大。石静、徐敏[34]发现我国总体和中、西、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断提高，空间非均衡性显著但整体呈缩小趋势。张磊[35]进行差异效应测算分解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原因往往是资源禀赋、市场经济发展、经济环境等，并且地区整体差异在2011-2017年逐年降低。

第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省域经济发展异质性呈U型关系。葛和平、朱卉雯[36]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GNI）的二次项显著正相关，得出经济水平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慢；只有经济发展突破临界水平，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作用才会开始显著。

第三，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龚沁宜、成学真[37]立足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以甘肃为代表的4省份减贫效果尤为明显。张长全、陆旭东[38]充分利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减贫影响强于东部地区。郑美华[39]等建立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在减贫效应层面，我国西部地区显著于中部和东部。

2.4 文献述评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基本概念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其测度方式。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文献，在绝对减贫的视角，直接机制主要是通过“数字”的优势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增加金融扶贫的精准性、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负担性，使得贫困群体能缓解资金约束、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收入水平，达到贫困减缓的目的。间接机制主要通过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增长间接带动贫困减缓。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关于数字普惠金融解决相对贫困的研究目前并不多，少有的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针对乡村、忽略了城市中也存在相对贫困群体；对于相对贫困的度量众说纷纭；减贫机制不健全或沿用绝对贫困的减贫机制。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区域异质性的文献研究，发现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本身的省域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不同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然而，对减贫机制的区域异质性研究主要针对个别省市或简单将中国分为中部、东部、西部进行讨论，忽略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其减贫效应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基于现有研究空间的局限性和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需要，本位以相对贫困为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解决相对贫困的效用机制，并引入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对以上机制进一步分析。

文献综述发现已有众多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绝对贫困的机制和其区域异质性进行研究，而较少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在实证设计部分，本文将基于长尾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马太效应、基数效应，归纳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以下篇幅中，如未指明绝对贫困，“减贫”均指代相对贫困。

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的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1 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相对贫困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将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科技技术整合到普惠金融中，让原先缺乏或无法接触到金融服务的群体，尤其是以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方便、及时、高质量、有尊严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信贷、储蓄渠道实现直接减贫，但出于利益追求和成本保障的“精英俘获”效应，传统金融机构相对排斥贫困群体，导致减贫效应不达预期[40]。第一，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更多的重心会放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群体往往有更充沛的存贷款需求，从而转化为存贷利差，构成银行的主要收入。他们也有更完备的资金条件去获取保险、投资、基金等衍生金融服务。金融机构的缺失导致贫困地区群体难以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第二，金融机构出于避险和成本的双重考虑，不愿贷款给低收入人群。由于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有限，偿债能力会受到怀疑。为了避免坏账的产生、征信信息搜集成本和逾期催收成本，传统的金融机构倾向于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数字”的优势，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精准性、可负担性。其依赖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拓展渠道至线上平台、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创新，使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得到提高；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完善贷款人征信系统，解决金融机构和贫困群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减贫的精准性；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降低金融服务过程中的成本，提升金融系统的可负担性。

长尾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利用20%的客户群体创造出80%的收入，因此如银行业的经营重心放在大客户的储蓄、理财、贷款服务上，往往忽视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旧有观念，将长尾客户(创造20%利润的80%客户群体)纳入了服务对象，单一个体创造的价值虽然微薄，但长尾的总和利润也不容小觑。如余额宝作为一款基金产品，类似于自动转移支付服务（Automatic Transfer Service）中的储蓄账户（saving accounts），通过按日计息、随时存取吸引了大量长尾客户，虽然单一个体的购买量小，但总体用户数量庞大，巧妙地运用了互联网技术使得长尾客户从金融服务中收益，达到了普惠效应。传统金融更难接触到交通不便利的地区，起到的减贫效应相对有限，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的渠道提高了对这部分长尾群体的触达性，从而达到减少贫困率的目的。

资源配置理论认为，资源稀缺时需要探求如何配置达到最优效果。中国政府在推动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时，强调特定化配比，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相对贫困人群中农村居民居多，“三农”、“乡村振兴”等政策都是亲贫性的政策，如果“三农”、“乡村振兴”等政策能够获得金融机构的倾斜性支持，农村收入水平将会显著提高，贫困发生率会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H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相对贫困。**

资源配置

提高可得性

增加精准性

提升可负担性

包容性增长

经济增长

减缓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长尾客户

缓解资金约束

增强抗风险能力

提升收入水平

亲贫性政策

图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

3.1.2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减贫效应的影响

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可能存在偏倚，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衡，进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

第一，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自身的经营效益和风险的权衡使其将投资重心着眼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信贷配给理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信贷配给不均的重要原因。因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群体拥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储蓄、保险、投资等，并且家庭资产、职业背景、收入情况都相对领先和稳定，能为他们的金融活动做背书。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群体，财富相对有限，也没有足够的信用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经营效益和经营风险的权衡，对于信贷投放会更加谨慎。

第二，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客户群体的教育经历、成长背景、投资理念都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群体往往有更全面的金融知识储备、更积极的金融理财思维，在金融服务中更具主动性。基于马太效应，更高的平均收入水平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储备，更高的学历水平使他们有能力理解金融知识，从而引发更加强烈的理财、投资需求。而经济落后地区的群体，缺乏资金、缺乏金融知识，更多涉及的金融服务局限于贷款、储蓄，缺乏投入理财、投资、基金等领域的积极性。

第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减贫基数大，改善的空间更大。根据基数效应，同样的减贫政策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收益群体的基数更多，形成的影响更显著。而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在基础建设、客户金融意识方面如互联网普及率、金融知识都更占优，但经济发达地区的相对贫困人群占比更少，起到的效用相对有限。

基于以上三点，初步判断经济发达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强，经济落后地区减贫效应其次，经济中等地区既没有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偏好和客户参与金融服务的高主动性，又没有经济落后地区的较大基数，减贫效应位居最后。

**H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金融机构

客户

经济相对落后

经济相对发达

经营效益

经营风险

金融机构权衡的

结果差异

金融知识储备不同

金融理财思维不同

客户参与金融服务的主动性差异

群体基数

相对贫困群体基数更大

经济中等

图3-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理论机制

3.1.3 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减贫效应的影响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5]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细分为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三个层面的子指数分别代表了数字金融在3个维度、33个指标层面的不同表现。

覆盖广度体现了数字金融能够触达用户的程度，覆盖广度越大，代表数字金融触达的用户数越多，主要通过支付宝用户账号数、绑卡比例、绑卡数量进行衡量。使用深度体现了用户使用线上信贷、线上支付、线上保险等各类金融服务的程度，通过线上金融服务的使用人数、使用活跃度来衡量。数字化程度通过衡量二维码、花呗、芝麻信用免押金等服务的使用频率，来度量线上金融服务的使用成本、便利性、信用化程度。

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普及程度、数字便利性更强，从而惠及更多人群。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移动支付、数字保险、数字信贷、数字投资的普及度相对低，数字网络的辐射效应相对低，导致减贫效应相对有限，但由于相对贫困群体基数大，减贫效应也较为客观。在经济中等地区，缺少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金融优势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大基数，减贫效应相对最低。

**H3：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对其产生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经济相对落后

经济相对发达

覆盖广度不同

使用深度不同

触达用户数量

线上金融服务的使用率

数字化程度不同

使用成本、便利性、信用化程度

经济中等

图3-3 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理论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假设如表3-1所示。

表3-1 研究假设表

|  |  |
| --- | --- |
| H1 |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贫困。 |
| H2 |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
| H3 |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对其产生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

3.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3.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理论上选取中国的31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区域性的宏观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包括城镇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公路里程数、产业结构、财政支出、人均收入、进出口总额、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数据。此外，本文选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反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和发展水平，该指数覆盖中国内地31省市，并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

3.2.2 样本选择

我国于2011年进入创新型互联网金融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也由此进入了正式的轨道。基于其发展历程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自2011年至2020年的样本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含全国范围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共包有310个指数数据和930个子指数数据。其余变量数据均为省域年度数据，同样选取2011年至2020年全国范围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宏观数据。

3.3 变量定义和实证模型

3.3.1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贫困发生率（POV）是被解释变量，出于指标合理性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参考ODHIAMBO[41]、崔艳娟[42]、黄倩[12]测度贫困的方式，选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形式作为贫困程度的度量标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贫困发生率的减弱、贫困情况得到缓解，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所以，POV数值的增加意味着贫困情况得到减缓。

2） 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郑美华[39]、张长全[38]等的方法，选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可细化为覆盖广度(CBreath)、使用深度(UDepth)、数字化程度(Dlevel)。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城乡差距、政府财政支出、通货膨胀率、对外开放程度、互联网普及率。借鉴了张长全[38]、郑美华[39]、王凤羽[31]的控制变量选取。

表3-2 变量指标定义表

|  |  |  |
| --- | --- | --- |
| 类型 | 变量名 | 定义 |
| 被解释变量 | POV | 贫困发生率，以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数衡量  本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划分区域 |
| 解释  变量 | DIFI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细化为覆盖广度(CBreath)、使用深度(UDepth)、数字化程度(Dlevel) |
| 控制  变量 | Is | 产业结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GDP |
| Gap | 城乡差距，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
| Gov | 政府财政支出，各地区财政支出/地区GDP |
| Inf | 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 |
| Open | 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地区GDP，通过年度平均汇率对进出口总额进行汇率转换 |
| Internet | 互联网普及率，使用互联网的设备数量/地区总人口 |

Is：衡量区域的产业结构。指标的提高能够表现第三产业的繁荣程度，作为需要大量人力的服务产业，提供了大量就职岗位，能够提高收入从而减贫。

Gap：衡量区域的城乡差距。减少贫富差距是我国国民经济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低收入群体生活生存的基础。

Gov：衡量区域的政府干预程度。目前我国减贫不仅要依靠市场和社会，最基础的需求是政府相应政策的配合和推进。

Inf：衡量区域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价格指数的上升，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重要环节。

Open：衡量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外贸业务越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遇也越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减贫。

Internet：衡量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数字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核心特点就是互联网，高互联网普及率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

3.3.2 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1，2，3，参考多位学者[12,31,38]的实证模型设计，建立以下基准模型：

POV𝑖,𝑡= 𝛽0 + 𝛽1DIFI𝑖,𝑡 + ∑𝛽𝑘C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𝜀𝑖,𝑡 （3-1）

其中，被解释变量POV表示贫困发生率；解释变量DIFI表示普惠金融指数；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𝜀为误差随机扰动项；i代表省市；t表示年份时间。

本文参考王凤羽等[31]的研究，新增交通基础建设（Traffic）作为调节变量，即公路里程数取对数。尝试在基准模型（3-1）的基础上引入交通基础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乘项。通过对交乘项系数进行估计，识别交通基建水平对区域减贫的影响。建立拓展模型：

POV𝑖,𝑡= 𝛽0 + µ1Traffic×DIFI𝑖,𝑡 +𝛽1DIFI𝑖,𝑡 + ∑𝛽𝑘C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𝜀𝑖,𝑡 （3-2）

本文参考李建军等[43]的研究，新增农业占比（AgrShare）作为调节变量，即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尝试在基准模型（3-1）的基础上引入农业占比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乘项。通过对交乘项系数进行估计，识别农业占比对区域减贫的影响。建立拓展模型：

POV𝑖,𝑡= 𝛽0 + µ2AgrShare×DIFI𝑖,𝑡 +𝛽1DIFI𝑖,𝑡 + ∑𝛽𝑘C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𝜀𝑖,𝑡 （3-3）

除此之外，本文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从不同侧面判断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层次的应用与发展对减贫起到的效用大小。

4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4-1是变量描述性分析的结果。

贫困发生率的最大值为最小值的1.26倍，反映了不同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差异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偏差达到97.030，子维度指数的标准偏差都大于95，反映我国数字普惠体系进步与发展的不均衡性较强，为后文基于经济水平不同的异质性探讨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三产业在2011年平均占比达到43.50%，截至2020年上升至53.89%，增幅高达23.89%，意味着我国近十年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卓有成效；城乡收入差距在2011年和2020年的最大值分别为3.67和3.26，最小值分别为2.02和1.86，降低幅度十分显著，表示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舒缓；政府干预平均占比29.7%，证明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相关决议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最大值1.464，最小值0.008，反映了不同区域对于外贸业务发生额的差异性大，外贸交易呈现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98.785%，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人拥有对互联网的触达能力，为后文对于减贫机制和普惠金融在数字化维度的探讨作铺垫。

表4-1描述性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均值 | 标准偏差 | 个数 |
| POV | 8.530 | 10.728 | 9.632 | 0.393 | 310 |
| DIFI | 16.220 | 431.930 | 216.235 | 97.030 | 310 |
| CBreath | 1.960 | 397.000 | 196.670 | 96.556 | 310 |
| Udepth | 6.760 | 488.680 | 211.121 | 98.187 | 310 |
| Dlevel | 7.580 | 462.230 | 290.142 | 117.252 | 310 |
| Is | 0.327 | 0.839 | 0.494 | 0.089 | 310 |
| Gap | 1.845 | 3.672 | 2.604 | 0.382 | 310 |
| Gov | 0.119 | 1.354 | 0.297 | 0.210 | 310 |
| Inf | 100.600 | 106.300 | 102.511 | 1.171 | 310 |
| Open | 0.008 | 1.464 | 0.269 | 0.287 | 310 |
| Internet | 52.040 | 189.460 | 98.785 | 24.685 | 310 |

表4-2是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验证了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总体来说，双变量之间基本上都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贫困发生率与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对于贫困发生率的减缓有着较强的影响与作用，初步结论与前文的分析保持一致。且贫困发生率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系数为0.750，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和发展可以正向地减小贫困发生率，实现减贫的效果。同时，贫困发生率与所有控制变量之间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地存在正向或负向的关系。贫困发生率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均为正，说明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开放的程度升级、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都能正向地促进居民消费生活水平的改善。贫困发生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的系数均为负，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利于减贫，而通货膨胀不利于减贫。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能够正向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下文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探讨进行铺垫。

如分析结果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低于0.8，初步判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较小，后文将利用VIF值做进一步的验证。

表4-2 相关性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POV | DIFI | Is | Gap | Gov | Inf | Open | Internet |
| POV | 1 |  |  |  |  |  |  |  |
| ----- |  |  |  |  |  |  |  |
| DIFI | .750\*\* | 1 |  |  |  |  |  |  |
| 0.000 | ----- |  |  |  |  |  |  |
| Is | .684\*\* | .529\*\* | 1 |  |  |  |  |  |
| 0.000 | 0.000 | ----- |  |  |  |  |  |
| Gap | -.561\*\* | -.358\*\* | -.146\*\* | 1 |  |  |  |  |
| 0.000 | 0.000 | 0.010 | ----- |  |  |  |  |
| Gov | -.375\*\* | -0.11 | .130\* | .443\*\* | 1 |  |  |  |
| 0.000 | 0.053 | 0.022 | 0.000 | ----- |  |  |  |
| Inf | -.320\*\* | -.568\*\* | -.181\*\* | .128\* | 0.022 | 1 |  |  |
| 0.000 | 0.000 | 0.001 | 0.025 | 0.701 | ----- |  |  |
| Open | .616\*\* | 0.079 | .555\*\* | -.379\*\* | -.308\*\* | .112\* | 1 |  |
| 0.000 | 0.164 | 0.000 | 0.000 | 0.000 | 0.049 | ----- |  |
| Internet | .846\*\* | .634\*\* | .754\*\* | -.291\*\* | -.160\*\* | -.240\*\* | .600\*\* | 1 |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5 | 0.000 | 0.000 | ----- |
| 注：\*\*、\*分别代表在 1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 | | | | | | |

4.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4.2.1 全样本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基准模型（3-1）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3所示。

表4-3 全样本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V | Coef. | Std. Err. | t-value | p-value | [95% Conf | Interval] | VIF | Sig |
| DIFI | 0.001768 | 0.000 | 13.780 | 0.000 | 0.002 | 0.002 | / | \*\*\* |
| Is | 0.486 | 0.133 | 3.640 | 0.000 | 0.223 | 0.748 | 3.62 | \*\*\* |
| Gap | -0.150 | 0.021 | -7.050 | 0.000 | -0.192 | -0.108 | 1.69 | \*\*\* |
| Gov | -0.290 | 0.038 | -7.600 | 0.000 | -0.365 | -0.215 | 1.65 | \*\*\* |
| Inf | 0.002 | 0.007 | 0.250 | 0.807 | -0.011 | 0.015 | 1.55 |  |
| Open | 0.352 | 0.040 | 8.720 | 0.000 | 0.273 | 0.431 | 3.44 | \*\*\* |
| Internet | 0.004 | 0.001 | 8.260 | 0.000 | 0.003 | 0.005 | 4.10 | \*\*\* |
| \_cons | 8.806 | 0.694 | 12.690 | 0.000 | 7.441 | 10.172 | / | \*\*\* |
| R-squared=0.9238 | | | | F(7,302)=522.73 | | | | |
| Adj R-squared=0.9220 | | | | Prob＞F=0.000 | | | | |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 | | | | | | |

由表4-3，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严格、显著为正，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贫困发生率的降低有着积极的作用。控制变量层面，产业结构（Is）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崛起能够较好地减缓贫困。城乡收入差距（Gap）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通胀率（Inf）的变化对降低贫困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Open）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了支持外贸、促进国内外经济体系循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实了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数字经济落实到绝大部分人群尤其是长尾群体，起到了解决相对贫困的效果。VIF均小于5，表示多重共线性较小，可以基于此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以上分析证明了本文的H1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相对贫困。

4.2.2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交通基础建设（Traffic）、农业占比（AgrShare）的交乘项的拓展模型（3-2）和（3-3）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4所示。

表4-4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因变量 | (1) | (2) |
| POV | POV |
| DIFI | 0.0022\*\*\* | 0.0019\*\*\* |
| (8.55) | (14.75) |
| Traffic×DIFI | -0.0001322\*\*\* |  |
| (-3.29) |  |
| AgrShare×DIFI |  | 0.0023\*\*\* |
|  | (4.22) |
| 控制变量 | 8.6480\*\*\*  (12.63) | 9.1399\*\*\*  (13.44) |
| 样本量 | 310 | 310 |
| R² | 92.64% | 92.80% |
| Adjusted R² | 92.44% | 92.61% |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 | |

数字普惠金融与交通基础建设的系数在第（1）列中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于0，表明在交通基建水平越低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减缓效用更强。支持了本文基于数字渠道和长尾理论提出的调节效应的正确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占比的系数在第（1）列中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大于0，表明在农业占比越高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减缓效用更强。支持了本文基于资源配置理论提出的调节效应的正确性。

4.3 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参照31个省市的人均GDP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天津、江苏、福建），经济中等地区（重庆、安徽、山东、湖北、四川、河南、湖南、陕西、辽宁、江西、内蒙古），经济落后地区（河北、吉林、海南、山西、黑龙江、云南、广西、甘肃、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用基准模型（3-1）分别对31个省市进行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5所示。

表4-5 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 | (1) | (2) | (3) |
| 经济发达 | 经济中等 | 经济落后 |
| DIFI | 0.001797\*\*\* | 0.000728\*\*\* | 0.001734\*\*\* |
| (11.11) | (4.36) | (9.39) |
| Is | 0.987\*\*\* | 2.446\*\*\* | -0.312 |
| (4.57) | (11.95) | (-1.39) |
| Gap | -0.254\*\*\* | -0.091\*\* | -0.147\*\*\* |
| (-4.55) | (-2.48) | (-5.96) |
| Gov | -0.163 | 0.636\*\*\* | -0.207\*\*\* |
| (-0.41) | (4.15) | (-5.78) |
| Inf | 0.006 | -0.007 | 0.008 |
| (0.46) | (-1.17) | (1.00) |
| Open | 0.267\*\*\* | 0.015 | -0.575\*\*\* |
| (4.72) | (0.21) | (-3.97) |
| Internet | 0.001 | 0.004\*\*\* | 0.006\*\*\* |
| (1.39) | (6.45) | (6.32) |
| 控制变量 | 8.803\*\*\* | 8.771\*\*\* | 8.466\*\*\* |
| (6.81) | (13.76) | (10.67) |
| 样本量 | 70 | 110 | 130 |
| F值 | 146.88 | 312.01 | 201.87 |
| R² | 94.31% | 95.54% | 92.05% |
| Adjusted R² | 93.67% | 95.23% | 91.60% |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 | | |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它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减缓贫困。为了进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本文按照人均GDP对于区域进行划分，实证结果表明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异质性。

经济发达、中等、落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减缓相对贫困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影响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001797，0.000728，0.001734，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系数是经济中等地区的2.47倍，并且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都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用，一方面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输送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金融减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程度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减贫提供了较好的保障。经济落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系数是经济中等地区的2.38倍，并且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远高于经济中等地区的系数，可能是P2P平台的出现促进了投资、借贷等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协助提高了运作效率、支撑了日常支付。因此，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益更高，可以更有效地缓解贫困。

产业结构的优化在经济发达和经济中等地区都能够减轻贫困，但在经济落后地区却相反，主要是因为经济落后地区往往以第一产业作为区域优势，而经济发达和中等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更高，推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能够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贫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在经济发达、中等、落后地区都能够显著地促进消费，说明打破城乡二元性经济结构是为了实现减贫应该去努力的方向。经济中等地区政府干预系数为正，证明了政府宏观政策与举措能对减贫起到积极影响，但经济落后地区系数却显著为负，政府干预甚至对贫困减缓有负面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挤压了个人的消费和投资。对外开放程度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对减贫呈现积极影响，在经济落后地区呈现出负面的作用，可能是因为贫困地区居民对外贸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在经济落后地区的积极影响最大，系数是经济中等地区的1.5倍，通过简单计算能够证明在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消费支出会增长0.6%，贫困发生率也会相应得到降低。

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H2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4.4 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用基准模型（3-1）分别对31个省市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6所示。

表4-6 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经济发达 | | | 经济中等 | | | 经济落后 | | |
| CBreath | 0.0020\*\*\* |  |  | 0.0007\*\*\* |  |  | 0.0017\*\*\* |  |  |
| (11.59) |  |  | (3.95) |  |  | (9.05) |  |  |
| UDepth |  | 0.0015\*\*\* |  |  | 0.0005\*\*\* |  |  | 0.0013\*\*\* |  |
|  | (9.24) |  |  | (3.4) |  |  | (7.36) |  |
| Dlevel |  |  | 0.0012\*\*\* |  |  | 0.0004\*\*\* |  |  | 0.0009\*\*\* |
|  |  | (7.49) |  |  | (3.81) |  |  | (6.10) |
| Is | 0.926\*\*\* | 0.934\*\*\* | 1.471\*\*\* | 2.507\*\*\* | 2.592\*\*\* | 2.661\*\*\* | -0.228 | -0.190 | 0.101 |
| (4.38) | (3.80) | (5.64) | (12.24) | (12.69) | (14.21) | (-1.01) | (-0.77) | (0.41) |
| Gap | -0.270\*\*\* | -0.196\*\*\* | -0.379\*\*\* | -0.099\*\*\* | -0.121\*\*\* | -0.126\*\*\* | -0.155\*\*\* | -0.139\*\*\* | -0.174\*\*\* |
| (-5.01) | (-3.01) | (-5.61) | (-2.66) | (-3.34) | (-3.67) | (-6.25) | (-5.11) | (-6.23) |
| Gov | -0.198 | 0.401 | -1.171\*\* | 0.638\*\*\* | 0.626\*\*\* | 0.516\*\*\* | -0.195\*\*\* | -0.231\*\*\* | -0.269\*\*\* |
| (-0.51) | (0.87) | (-2.36) | (4.09) | (3.94) | (3.36) | (-5.28) | (-5.96) | (-6.7) |
| Inf | -0.003 | 0.001 | 0.009 | -0.011\* | -0.014\*\* | -0.001 | 0.000 | -0.009 | 0.012 |
| (-0.26) | (0.10) | (0.57) | (-1.88) | (-2.54) | (-0.17) | (-0.04) | (-1.16) | (1.21) |

表4-6 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回归结果 （续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 | 0.293\*\*\* | 0.167\*\*\* | 0.229\*\*\* | 0.003 | -0.048 | -0.029 | -0.531\*\*\* | -0.673\*\*\* | -0.796\*\*\* |
| (5.25) | (2.80) | (3.21) | (0.04) | (-0.69) | (-0.41) | (-3.58) | (-4.29) | (-4.89) |
| Internet | 0.001 | 0.002\* | 0.002 | 0.004\*\*\* | 0.005\*\*\* | 0.005\*\*\* | 0.005\*\*\* | 0.008\*\*\* | 0.009\*\*\* |
| (1.21) | (1.90) | (1.56) | (5.64) | (8.68) | (8.66) | (5.16) | (8.49) | (9.29) |
| 控制变量 | 9.759\*\*\* | 9.095\*\*\* | 8.741\*\*\* | 9.196\*\*\* | 9.524\*\*\* | 8.162\*\*\* | 9.372\*\*\* | 10.054\*\*\* | 7.735\*\*\* |
| (7.95) | (6.26) | (5.24) | (15.04) | (15.84) | (10.65) | (12.2) | (12.42) | (7.33) |
| 样本量 | 70 | 70 | 70 | 110 | 110 | 110 | 130 | 130 | 130 |
| F检验值 | 155.93 | 114.84 | 87.14 | 302.93 | 291.88 | 299.99 | 195.24 | 166.42 | 148.66 |
| R² | 94.63% | 92.84% | 91.95% | 95.41% | 95.25% | 95.37% | 91.80% | 90.52% | 89.51% |
| Adjusted R² | 94.02% | 92.03% | 90.90% | 95.10% | 94.92% | 95.05% | 91.33% | 89.98% | 88.90% |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 | | | | | | | | |

根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的实证回归结果，在覆盖广度（CBreath）层面，系数在三个地区都显著为正，对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效益略高于经济落后地区、远高于经济中等地区，表明了增强数字金融的触达性对减缓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的贫困现状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使用深度（UDepth）层面，其对于三个地区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强线上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减贫效果最佳，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效果虽次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差距非常小，经济中等地区的效果相对差。在数字化程度（DLevel）层面，其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地区都有显著的积极效用，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估计系数是经济落后地区的1.33倍，是经济中等地区的3倍，表明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H3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对其产生的减贫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且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4.5 稳健性检验

4.5.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可支配收入替代消费支出作为因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7所示。

表4-7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V | Coef. | Std. Err. | t-value | p-value | [95% Conf | Interval] | Sig |
| DIFI | 0.001749 | 0.000 | 17.250 | 0.000 | 0.002 | 0.002 | \*\*\* |
| Is | 0.636 | 0.120 | 5.300 | 0.000 | 0.400 | 0.873 | \*\*\* |
| Gap | -0.201 | 0.020 | -10.300 | 0.000 | -0.239 | -0.162 | \*\*\* |
| Gov | -0.274 | 0.035 | -7.880 | 0.000 | -0.343 | -0.206 | \*\*\* |
| Inf | -0.013 | 0.006 | -2.270 | 0.024 | -0.024 | -0.002 | \*\* |
| Open | 0.271 | 0.034 | 8.000 | 0.000 | 0.204 | 0.338 | \*\*\* |
| Internet | 0.005 | 0.000 | 11.030 | 0.000 | 0.004 | 0.006 | \*\*\* |
| \_cons | 10.659 | 0.598 | 17.830 | 0.000 | 9.483 | 11.835 | \*\*\* |
| R-squared=0.9445 | | | | F(9,300)=734.82 | | | |
| Adj R-squared=0.9433 | | | | Prob＞F=0.000 | | | |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 | | | | | |

根据表4-7，我们发现使用可支配收入作为因变量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仍能起到显著的减贫效用。观察DIFI的系数，虽然系数为0.001749，略小于模型（3-1）的回归系数0.001768，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了本文结论H1成立，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相对贫困，表明了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4.5.2 内生性处理

模型内生性问题主要可能由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与减贫之间的反向因果性导致，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减贫，同时贫困的减缓可能反过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因此，本文通过使用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DIFI）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内生性处理模型如下：

POV𝑖,𝑡= 𝛽0 + 𝛽1DIFI𝑖,𝑡-1 + ∑𝛽𝑘C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𝑡 + 𝜀𝑖,𝑡  （3-4）

回归结果如表4-8所示。

表4-8 内生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V | Coef. | Std. Err. | t-value | p-value | [95% Conf | Interval] | Sig |
| DIFI | 0.001750 | 0.000 | 12.400 | 0.000 | 0.001 | 0.002 | \*\*\* |
| Is | 0.582 | 0.150 | 3.870 | 0.000 | 0.285 | 0.878 | \*\*\* |
| Gap | -0.133 | 0.024 | -5.590 | 0.000 | -0.180 | -0.086 | \*\*\* |
| Gov | -0.256 | 0.042 | -6.140 | 0.000 | -0.338 | -0.174 | \*\*\* |
| Inf | -0.020 | 0.011 | -1.820 | 0.070 | -0.041 | 0.002 | \* |
| Open | 0.427 | 0.049 | 8.710 | 0.000 | 0.330 | 0.523 | \*\*\* |
| Internet | 0.004 | 0.001 | 6.430 | 0.000 | 0.003 | 0.005 | \*\*\* |
| \_cons | 10.997 | 1.118 | 9.840 | 0.000 | 8.795 | 13.199 | \*\*\* |
| R-squared=0.9106 | | | | F(9,300)=345.04 | | | |
| Adj R-squared=0.9080 | | | | Prob＞F=0.000 | | | |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 | | | | | |

根据表4-8，我们发现使用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普惠金融仍能起到显著的减贫效用。观察DIFI的系数，虽然系数为0.001750，略小于模型（3-1）的回归系数0.001768，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了本文的关键结论H1成立，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相对贫困，证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有稳健性。

5 结论和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1-2020年31省市的数据为样本，剖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深入研究了调节效应，并探讨了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区域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子指数的不同减贫效果，通过实证验证减贫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积极地减缓相对贫困。控制变量层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对外贸的支持提升、互联网普及率提升都能够很好地减缓贫困。交通基础建设水平越低、农业占比越高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作用更强。

第二，在区域异质性的实证研究中，证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经济落后地区的减贫效应略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地区最弱且与前两者有较大差距。控制变量层面，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在经济发达、中等、落后地区都能够显著地促进消费，而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程度、互联网普及率在各个地区的效果各异。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子指数层面，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产生的减贫效果在经济发达、落后、中等地区递减。

5.2 研究建议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金融数字化的建设愈发引起了政府、社会等多层面的重视。为了中国的数字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长尾人群，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建议：

第一，发展互联网技术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大众。一方面，加强对各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通信基站的建设，使宽带网络能够覆盖到偏远地区的人群，使更多相对贫困人群能对金融服务“触手可得”。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数字金融体系，使得金融服务更加高效、安全、便捷，提高相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渗透率。这可以有效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都能起到较好效用。

第二，产品结构多层次化，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良性结合。依照国家的金融战略，数字金融服务供应商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从而提升服务效益，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如大型商业银行应当利用其广泛的网点覆盖、雄厚的资金实力、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稳固的风控体系，缓解农村严重的资金流失，更多地为长尾人群提供服务。政策性银行尤其是农发行，应当聚焦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精准施策，创新提供差异化的特惠支持政策，从而实现金融扶贫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基于不同地区的特点推出创新型扶贫政策，如灵璧县出台“一自三合”模式，解决相对贫困群体贷款难的问题。

第三，政策性措施因地制宜，总体上要鼓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状况，对于产业结构、开放程度、政府干预应当因地制宜。但总的来说，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和发展刻不容缓。各地政府机关应当构建数字金融的法律规范，并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保障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

5.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文采用2011至2020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其子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并进行了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探讨研究局限性，并基于此提出未来可以钻研的研究方向。

5.3.1 样本选取问题

受到信息可得性的影响，数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本文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研究减贫，而不是以更加细分的行政区域如地级市、行政区作为划分单位，忽视了如部分省市中的省会城市经济水平可能远超于省市水平，导致实证结论可能不完全适配每一个行政区域。但是本文旨在通过经济划分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更细分的行政单位可以依照人均GDP自行划分并对号入座本文结论。所以文章的结论仍然具有价值。未来可以进一步地细分行政区域至地级市，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精准化。

5.3.2 相对贫困的测度

目前我国对于相对贫困的测度标准并没有统一规定。本文以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作为贫困发生率的衡量指标，没有能够完全精准地划分相对贫困人群。但是人均消费水平作为我国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仍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民生的实际情况，本文的结论仍然具有合理性。未来希望有更加精准的标准对相对贫困群体进行划分，使文章结论能够更大程度上做到精准扶贫。

致 谢

论文至此搁笔，代表着已经不得不为大学四年的生活画上句点。经历了四个春去秋来、寒冬酷暑，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值得珍藏的记忆。东九路上的人群拥挤，着急忙慌地跑进教室，艳阳高照或是晚风舒适的日子出门郊游，在管报办晚会总是前后台不停跑……一些碎片化的画面好像拼凑出了我的整个大学时光。

首先，非常感谢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以清晰的逻辑和渊博的学识教会了我很多知识，尤其是我的导师石冠群老师，在写作论文期间耐心细致地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次，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从小就尊重我的个人意见，也会一直在背后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最后，感谢一路走来遇到的朋友们，让我的大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特别感谢我的男朋友郑凯文，春天的暖阳、夏日的晚风、秋季的梧桐、冬日的飘雪都是我们彼此陪伴和支持的见证，来日方长，未来也想跟你继续分享越来越好的生活！

对自己，希望在未来也能怀揣对生活、对梦想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也祝愿所有人前程似锦！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脱贫步伐加快 扶贫成效显著 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EB/OL].(2015-10-26).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10/t20151016\_1257098.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全面小康[EB/OL].(2021-9-28).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47054/index.html

[3] 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51(02):111-125.

[4] 刘桂平.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几个问题[J].中国金融,2021(16):9-12.

[5]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EB/OL].(2021-9-8).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35821/index.html

[6]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王瑱.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5(04):12-22.DOI:10.13910/j.cnki.shjr.2015.04.003.

[7] 刘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分析与建议[J].现代金融导刊,2022(02):28-33.

[8]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EB/OL].https://www.fxbaogao.com/pdf?id=2333197，2020年12月17日.

[9] Khan I,Sayal A U,et al. Does financial inclusion induce poverty,income inequality,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54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21,49:303~314

[10]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06):14-25.

[11] 张贺,白钦先.数字普惠金融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0):122-129.

[12] 黄倩,李政,熊德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改革,2019(11):90-101.

[13] 刘锦怡,刘纯阳.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财经论丛,2020(01):43-53.DOI:10.13762/j.cnki.cjlc.2020.01.004.

[14] 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经济学家,2020(05):99-108.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0.05.011.

[15] Geda A,Shimeles A,Zerfu D. Finance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A Household- Level Analysis[R].Research Paper No 51,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2006.

[16]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17] 邹新月,王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0,35(04):133-145.

[18] 梁榜,张建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激励创新吗?——来自中国城市和中小企业的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19,41(05):74-86.

[19] 万佳彧,周勤,肖义.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评论,2020(01):71-83.DOI:10.19361/j.er.2020.01.05.

[20] 唐文进,李爽,陶云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28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4(06):35-49.

[21] Sarma M.，Pais J..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1（5）：613 ~ 628．

[22] Beck T.，Demirguc-Kunt A.，Martinez Peria M. S..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J］．Social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7（1）：234 ~ 266．

[23] Arora R.. Measuring financial access［Z］．Griffith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2010．

[24] Gupte R.，Venkataramani B.，Gupta D.. 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J］．Procedia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2012（1）：133-149．

[25]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DOI:10.13821/j.cnki.ceq.2020.03.12.

[26] 李涛,彭东蔓.数字金融减贫：研究热点综述及展望[J/OL].财会月刊:1-7[2022-04-0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90.F.20220329.1117.020.html

[27] 马彧菲,杜朝运.普惠金融指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05):45-53.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7.05.005.

[28]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08):71-86.

[29] 于敏,王小林.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测量与评价[J].经济评论,2012(03):30-38.DOI:10.19361/j.er.2012.03.004.

[30] Claessens,S.,and Feyen,E.,2006.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31] 王凤羽,冉陆荣.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03):105-114.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2.03.010.

[32] 郭小卉,冯艳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基于京津冀县域空间面板数据[J].武汉金融,2021(02):70-80+88.

[33] 金发奇,言珍,吴庆田.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1(01):14-21.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1.002.

[34] 石静,徐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J].西部金融,2021(08):10-21.DOI:10.16395/j.cnki.61-1462/f.2021.08.003.

[35] 张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异质性与动态一致性研究[J].北方金融,2022(02):55-60.DOI:10.16459/j.cnki.15-1370/f.2022.02.020.

[36] 葛和平,朱卉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新金融,2018(02):47-53.

[37] 龚沁宜,成学真.数字普惠金融、农村贫困与经济增长[J].甘肃社会科学,2018(06):139-145.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8.06.021.

[38] 张长全,陆旭东.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79-84.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20.03.020.

[39] 郑美华,刘芃麦,王刚贞.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20(03):68-75.

[40] 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51(02):111-125.

[41] ODHIAMBO N M. Finance-growth-poverty nexus in South Africa: A dynamic causality linkage［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9, 38(2): 320-325.

[42]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

[43] 李建军,彭俞超,马思超.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20,55(04):37-52.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题 目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实证研究

（任务起止日期：2021年11月2日～2022年6月5日）

院 系\_\_\_\_\_\_\_管理学院\_\_\_\_\_\_\_\_

专业班级\_\_\_\_\_\_\_财务管理\_\_\_\_\_\_\_\_

姓 名\_\_\_\_\_\_\_\_周子乂\_\_\_\_\_\_\_\_\_

学 号\_\_\_\_\_U201815896\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石冠群\_\_\_\_\_\_\_\_\_

教研室（系、所）负责人 2021年10月28日审查

院（系）负责人 2021年11月2日批准

|  |
| --- |
| 课题内容：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进行实证回归和异质性分析。  1）文献综述主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其减贫效应、其发展的省域异质性的文献进行展开。基本介绍从发展历程、作用与意义、测度方式展开；减贫效应分别从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进行归纳；省域异质性从三方面的异质性进行介绍。  2）实证设计中，基于长尾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马太效应、基数效应提出三个基本假设：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区域存在异质性；其子指数的减贫效应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效果。建立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  3）实证结果分析部分。第一，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第二，基于基本模型对样本数据做全样本回归，得出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的估计值，验证相应假设。并加入调节效应验证农业占比和交通基础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影响；第三，分样本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判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子指数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减贫效应的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4）结论与建议中，本文将归纳实证研究结果，结合以往的文献研究和现有理论从普惠金融建设、政府措施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并基于本文提出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
| 课题任务要求：  本文通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异质性的理论分析和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异质性的实证检验，探寻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减贫效应的影响。并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度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全面减贫尤其是乡村减贫的方法和相关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由指导教师选定）  陆凤芝,黄永兴,徐鹏.中国普惠金融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7,32(01):111-120.  张长全,陆旭东.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79-84.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20.03.020.  李涛,杨胜兰.普惠金融减贫：研究热点及未来展望[J].财会月刊, 2021(22): 130-136. DOI:10.19641/ j.cnki.42-1290/f.2021.22.018.  黄倩,李政,熊德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改革,2019(11):90-101. |
| 同组设计者  无 |
| 指导教师签名：  2022年2月21日 |